

论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

张连义

(菏泽学院, 山东菏泽, 274015)

摘要: 路遥小说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化意蕴, 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 这一方面根源于陕北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 另一方面与路遥的经历及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有关。路遥与农村农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决定了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成分, 而对现代文明的接受又使其具有了超越性特征。

关键词: 路遥小说; 民间叙事; 现实主义精神; 陕北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4-0122-05

陕北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底蕴, 生于斯长于斯的路遥深受影响, 其作品蕴涵着浓郁的民间文化的因子, 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显示出强烈的民间意味。同时, 路遥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 能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对民间文化加以审视, 作品又呈现出时代性特征。路遥小说中民间意蕴与现代性特征的并存, 显示出对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超越, 昭示出地域文化与个人经历对路遥创作的双重影响。

陕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上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过渡地带, 民族交往频繁, 战乱频仍, 形成“以原生农耕文化为主体, 融汇游牧文化驳杂多样性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1](3)}战争的破坏, 交通的不便, 使陕北逐渐成为封闭和落后的地区, “不发达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 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 造就了文化的朴素性和保守性”除个别人口集中的大城市, 其余“基本属于大众化、贫民化文化类型, 且其传承性大于变异性, 自守性大于开放性, 保守性大于创新性”。^{[1](48)}也因此, 古代文化在这一带保存较为完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央红军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陕北并建立了延安政权, 后来又有许多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革命圣地, 陕北文化又一次受到外来影响, 形成富有特色的“延安文化”。出于政治需要, 延安政权非常重视民间文化的利用和对

农民农村的改造, 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 不仅民间文化受到重视, 而且知识分子还主动走进民间, 既以民间形式表达着新的时代内容, 也为民间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在接受民间改造的同时也影响着民间文化。由于屡受外来影响, 陕北文化呈现出驳杂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中共政权对农民农村的重视使民间文化得到发掘和进一步彰显, 陕北文化不仅作为文化按照自己的规律在传承, 而且还在人为的改造中被有意识的加以运用; 不仅作为一种心理惯性得以传承, 也作为一种资源被不断张扬。

“大凡一个社会, 从表面上看来, 种种组织, 小若家庭, 大若国家, 东洋西洋, 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 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是这些心理, 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 倒是文学上表现得最是明显。”^[2]陕北民间文学不仅是陕北文化心理的记录, 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承载着较多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因子, 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民间故事和民歌。作为陕北的代表作家, 路遥深受陕北文化影响, 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发掘和表现, 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叙事成分。

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价值伦理等方面。

首先, 是叙事视角。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是现代小说流行的叙事方式, 第三人称是全知全能视角, 对

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发生的背景等都可以作详细的介绍，但另一方面，因为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渲染性。路遥吸取了民间文学尤其是“说话”的营养，除了《基石》《你怎么也想不到》等少数作品外，大都采用了类似话本小说“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3](106)}通过“虚拟情境”(simulated context)达成一种“似真”(verisimilitude)的效果。^{[4](80)}叙述者不仅走上前台继续陈述故事，而且直接发出声音，袒露感情，渲染气氛，“填补虚构与真实世界间的裂缝，达成一部作品所谓‘真实的动机’(realistic motivation)。换句话说，说话人的声音增添某一作品的说服力”。^{[4](82)}由于虚拟情境的营造和感情的渲染，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直接与读者(听众)沟通，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过程也是与读者(听众)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在充当叙述者的同时，通过与读者(听众)一起感受故事又扮演着听众的角色。这时的叙述者已经不仅仅是陈述者，而是扮演了叙述者与读者(听众)的双重角色，模糊了故事的虚拟情境与陈述故事的真实场景的界限，从而达到逼真效果。

路遥小说中，叙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隐退在故事后面，某种情境下又会走上前台直接充当叙述者(第一人称)，并以议论与抒情的插入扮演着叙述与听众的双重角色。《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恋爱时，高加林去找刘巧珍的描写：高加林从出发到路上，叙述者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可当巧珍出现时，叙述者直接走上前台，走进读者，扮演了叙述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角色，“正当他犹豫地望着刘立本家的高墙大院时，突然看见大门外那棵老槐树背后转出一个人，匆匆地向坡下走来了。啊，亲爱的人！她实际上一直就在那里不抱什么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出现”。^{[5](131)}议论和抒情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通过“虚拟情境”的营造使读者走进作品，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路遥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议论和抒情既是作者的，也是叙述人的，更是读者的，作家不加掩饰的情感宣泄，坦呈着内心的爱恨情仇和伦理观念。

由于陕北落后闭塞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普通老百姓很难有条件接受教育，“大部分地区教育不举，文事不兴，礼仪不振，……生产、生活知识大都以村庄、宗族、血亲为主脉传承，连语言特点都可以逐村辨认”。^{[1](48)}民间文学主要表现为口头文学，陕北民歌的发达就是佐证。“讲故事”成为民间消遣与娱乐的主要形式，民间说书艺人讲述故事的时候，不仅作为一个叙述者，而且还扮演着听众的角色。说书艺人作为叙述者把故事的信息传达给读者，同时，又作为一个

旁观者与读者一起分享着故事的信息，表达着自己的感情，从而又扮演了听众的角色，这种角色分裂使作品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更易激起听众的共鸣。路遥的叙事技巧与民间说书艺人这种角色分裂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量议论、抒情的穿插以及充满感情的议论、抒情等情感渲染有着鲜明的说书人“讲故事”的痕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路遥的作品中不时会出现带有“()、——”等表示解释、说明的符号，比如孙玉亭在双水村开批判大会讲话时声音沙哑，作品说明是(因吃肉口渴)，^{[6](64)}这显然是民间说书艺人力求对事件交代完整的遗留。路遥小说的叙事视角与民间文学有着出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糅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其次，是叙事结构。陕北民间文学发达，不仅有信天游等民歌表达火辣的感情，而且还出现了韩起祥、张俊功等著名说书艺人。民间文学中典型的故事模式是穷书生遇贵族小姐搭救、金榜题名而终获大团圆的结局，由这一模式衍生的还有“始乱终弃”的“陈世美”模式，在路遥小说中，最典型的的就是这类模式。

《人生》中，高加林被拿下教师，巧珍主动追求，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安慰，包括痴心的爱情，刘巧珍的父亲刘立本是高家村的“二能人”，家境富裕，而高家则家境贫寒，加林的父母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刘巧珍主动追求加林，是典型的落难公子遇富小姐的模式；《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对孙少安，田晓霞对孙少平等都有贵族小姐与穷书生故事模式的影子。高加林进城后遇到亚萍抛弃了巧珍，是典型的“陈世美”现代版。民间文学中，落难书生与遭遗弃的贵族小姐往往被寄予同情，始乱终弃的“陈世美”则遭人唾弃。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路遥则抱着理解的态度，对此进行着理性的书写。对民间文学中饱受谴责和批判的始乱终弃的当代“陈世美”——高加林，作者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当时写作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

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7](414)}落难公子遇贵族小姐搭救的模式中，作家着重挖掘的是个人奋斗者的人格魅力和现代“贵族小姐”温柔善良的一面，遭人遗弃的刘巧珍被“圣化”，甚至成为“地母”的象征，宽容、温存、善良是其典型性格，即使被伤害也不计前嫌，甚至被抛弃后还想办法要求高明楼给加林安排代课老师的职务。加林回归农村时撕心裂肺的痛苦，正是作家对农村农民复杂心态的真实表达。路遥对民间文学不是照搬，而是浸淫其中，成为一种潜意识影响着自己的创作。路遥将人物置于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审视和拷问，挖掘其背后的时代因素，显示出超越性特征。

陈思和先生在分析《沙家浜》等作品时，认为《沙家浜》等样板戏的真正艺术价值是民间文化中的某种隐形结构，其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8](168)}除此之外还有“道魔斗法”等民间隐形结构。路遥小说显然有着民间隐形结构的影子，但又做了新的尝试，《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张克南以及《平凡的世界》中顾养民、孙少平、郝红梅、田晓霞、高朗、金秀等连环套的感情纠葛；孙少安、金俊武与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明争暗斗，……既承续了民间隐形结构的传统，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丰富了故事情节，使叙事结构呈现出复杂化态势，显示出内在的张力。

再次，是人物塑造。民间文学中，有一类人物扮演着“侠义者”或“谐谑者”（小丑）的角色，尽管出场不多，其地位却不容忽视，这类人物不仅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且往往成为紧张故事的调味剂，使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审美形态。路遥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德顺老汉、王满银、田万有、孙玉亭等就是典型。尽管路遥说德顺爷爷与他喜爱的俄国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中浪漫描写有着亲密关系，但与民间文学中“侠义者”的传承关系还是清晰可见；谐谑者更是显示出与民间文学的血缘关系，尤以孙玉亭最为典型。下面就以孙玉亭为例作简要论述。

孙玉亭是双水村的“革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人“革命家”，家徒四壁、穿着破烂，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满脑子阶级斗争思想，一心扑在“公务”上，对自家的生产劳动毫不关心。受历次运动影响，其思想已经被“政治化”，定格于阶级斗争，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中显得迂腐和呆板；同时，其生活的双水村是典型的宗族思想浓厚的农业社会，人们崇尚劳动，鄙视好逸恶劳，田、孙、金三大家族之间又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是非，由此，作为双水村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

孙玉亭的思想和行为便显得滑稽可笑。其实，这一类型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笑料，类似于民间故事的小丑，出场便会刺激观众“笑”的神经。侄女婿王满银被劳教，在开批判会的时候，以往经常到哥哥嫂子家的孙玉亭，第一次没有到哥哥嫂子家里去，而是在外面喊哥哥出来参加批斗会，哥哥拒绝后尽管对哥哥很不满，认为最应该受批判的就是哥哥，但他分得很清楚：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批斗会要各村找批判对象，孙玉亭没有办法找出了傻子田二充当，当田二走上批判台的时候，引起观众大笑，而主持和参加批判会的领导以及念批判稿的青年的严肃态度更是与田二的傻形成反讽，“笑果”背后是无奈的凄凉与辛酸。批判会开始之前有个细节更是民间故事的惯用笔法：“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亭，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6](63)}与王彩娥偷情被捉的时候，孙玉亭“总有个组织哩……”的嘟囔显示出迂腐与可爱的一面。作家通过对类似行为的渲染和揶揄，达到逗笑的目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对类似细节的书写和强调，显然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民间文学的深厚渊源。

民间故事中，孙玉亭、王满银显然是被批判和被否定的一类，但作家在揶揄、挖苦的同时却着力挖掘其蕴涵的人性色彩。批判大会结束之后，孙玉亭喊着傻子田二父子一起回去。“逛鬼”王满银劳教时不忘嘱咐孙少平告诉兰花收好老鼠药，不要叫孩子们误吃了；尽管常年漂泊在外，每逢过年都要回家，还不忘记给孩子们买小玩意；在外飘荡多年看到华发终于幡然醒悟，回家与老婆好好过日子，如此等等。民间文学的人物好坏分明，带有“脸谱化”的痕迹，路遥笔下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正如他所说“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或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9](19)}即使被批评的人物如田福堂、高明楼等，作家也在发掘他们身上人性人情和作为乡村政治家精明的一面，作家对他们充满了理解、同情和敬意，在批判的同时着重发掘其作为一个乡村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在家庭事务中表现出的亲情。作家打破好人坏人的界限，还原生活中“人”的真实，超越了民间文学中简单的二元划分，显示出对生活的尊重和复杂人性的理解，同时也标志着作家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与超越。

最后，以道德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民间文学张扬人性，注重人情，道德规范往往成为判定人物好坏的标准。路遥的创作聚焦于社会转型时期陕北农村农民的生活，同样坚持了道德标准，但由于对农村农民

的过度了解和情感投入，其道德标准显示出一定的复杂性，倾向民间伦理的同时具有了现代性的内涵。

高明楼为了儿子的出路拿下了加林的教师，村民们见怪不怪，可见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高明楼也由此被称为“强人”，这里的“强人”显然带着否定的成分。黄亚萍在高加林进城后疯狂爱上了加林，但她的爱是以牺牲巧珍为前提的；在与加林的恋爱中她始终是主导，作家对她尽管怀着同情和理解，但同时显然内蕴着一定的否定因素：“业余华侨”的称谓和过度任性的性格显然与现代女性对现代婚姻的追求无关，路遥秉持的显然是一种道德标准。考上大学的小丽对高大年的冷漠，刘丽英对物质的追求等，作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卢若琴对高广厚的关照，田润叶对李向前的忏悔等显示出道德的力量，道德成为判断人物的重要标志。可见，作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出于一种道德。只不过在作家笔下，其道德标准既不局限于传统道德，也不能纳入现代理性，而是集合了二者长处的“善”的追求。

传统道德既有基于人性人情的精华又有着封建礼教的糟粕，对封建性的糟粕，作家是持否定态度的。刘立本嫌贫爱富反对巧珍与加林的婚姻，“神汉”刘玉升搞封建迷信等，这些显然是作家所要否定的，并在否定中展开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对现代文明作家也有着理性的认识：现代文明既有顺应历史潮流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同时又有着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冲击人情压抑人性的一面。对杜丽丽与武惠良、古风铃的感情纠葛，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作家都持审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对理性的追求势必以人性人情的丧失为代价，这是作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正如作家所说“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9](154)}正是理性地意识到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文明的工具理性的弊端和传统道德中人性人情的精华，作家陷入道德评价的两难。高加林游移于城市和乡村、亚萍和加林之间的感情，典型地表现出作家的矛盾心态。到了《平凡的世界》，路遥则试图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长处而建立普适性的道德标准，孙少平在双水村的做法几乎等于完人，他身上凸显着传统道德人情与现代文明理性的优点，如果以城市中的现代文明来看，显然有着小农经济落后的一面，但其传统中又渗透着现代文明意识，显示出进步的一面；进入城市，又努力以传统道德的人性

人情化解现代工具理性的弊端，从而达成道德完善的目的。孙少平的道德追求基本可以代表作家的道德标准，那就是力求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优点，建立一种基于人情人性的以“善”的追求为中心的完善道德。现实生活中，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工具理性的强势地位和传统道德的封建性糟粕不约而同地合流，使作家的追求成为泡影，“善”的追求成为理想悬浮于作品之中。

路遥的这种以道德为标准的评判尺度显然与民间文学一脉相承。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民间是藏污纳垢之地，一方面，它是作家的创作资源，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间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在“善”的理解上，路遥的追求尽管与民间文学的内涵不一样，但以道德为标准，追求道德完善和心灵净化这一层面，则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在作家吸取民间资源追求完善道德的时候，其关于“善”的追求也必然通过读者接受而沉淀为民间资源的一部分，最终起到教谕大众的目的。

三

路遥小说中的民间叙事客观原因是陕北文化土壤的培育，主观原因则是作家的经历和创作思想。

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学较为发达，对古代文化的保存相对完整。路遥出身于陕北农村贫困家庭，又长时间生活在陕北，民间文化已经渗入其意识深处成为一种心理惯势影响着他的创作。路遥出生于农村，在农村读完小学，后来又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中的娱乐方式是民歌和故事，长时期生活于农村的路遥耳濡目染，必然会受到民间故事、民歌乃至民间是非观念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路遥曾经参与了陕北民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0]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路遥与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

路遥对故土、对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作家多次提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求作家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作家的劳动》《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等随笔中，路遥多次表达了作家的创作就是劳动，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等思想）。路遥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的动机之一是觉得全社会都应该“从各个方面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对巧珍、德顺爷爷等人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是“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

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9](131)}作家不仅怀着深厚的感情和敬意描写农村农民,而且通过他们寄予自己的理想,承担对国家民族的使命。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庄严的使命感使作家自觉地对农民的生活习惯及精神生活进行过滤和提纯,或者说是对农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同情和讴歌表达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自觉承担国家民族未来的庄严使命,对民间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势必在对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等的贯注中充分体现。

路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使在新方法层出不穷、现实主义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9](16)}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生活的尊重。路遥的创作贯彻着现实主义精神,聚焦于陕北农村,深情而真挚地书写着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与民间文学密不可分,农民的心理、习惯、生活方式等等显示出强烈的民间性成分,路遥对农民的书写就是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张扬与审视,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成为必然。

文学是文化的集中表达,分析路遥小说中民间文学因素,探究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关联,不仅可以窥视作家对民间文学的传承与超越,还可以由此进一步窥探陕北文化,达到通过作品了解文化的目的;同时,通过对陕北文化的研究解读作品,也为研究路遥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而进一步丰富路遥研究的内容。

注释:

陕北民歌主要有信天游、陕北道情等,路遥创作与陕北民歌关系,已有诸多论述,且民歌对叙事文学来讲更主要体现为一种故事基调和精神,对路遥小说形式上的影响远不如民间故事强烈。故本文陕北民间文学主要指民间故事,讨论的重点也是路遥创作与民间故事的关系。路遥曾经这样说,“譬如《人生》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为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种一种场景:在日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的驶过辽阔的大草原”。路遥.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5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参考文献:

- [1] 吕静. 陕北文化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 [2] 朱希祖. 中国古代文学的社会心理[J]. 新青年, 第九卷第五号.
- [3] “话本小说的全知叙事属于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但是它与现当代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并不相同,在它的文本中,一般不出现第一人称,而只是向叙述接受者明确显示叙述者的直接存在”。罗小东. 话本小说叙事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 [4] “虚拟情境”由韩南教授提出,“韩南教授曾将古典中国白话小说对说话形态无休止的拟仿称为‘虚拟情境’,意为‘假称一部作品于现场传颂的情境’”。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5] 路遥. 路遥精选集[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 [6] 路遥. 平凡的世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7] 路遥. 路遥文集(第二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8]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9] 路遥. 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0.
- [10] 申沛昌. 路遥: 一个令陕北人感到无限荣耀的作家[N]. 延安日报, 2007-11-7.

On the Folk Narrative in Lu Yao's Novels

ZHANG Lianyi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 Lu Yao's Novels has a rich folk meaning, mainly as narrative perspective, narrativ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value judgments. This area is rooted 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 Northern of Shanxi.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erience of Lu Yao and the pursuit of the realism. The close contact with farmers, and deep feelings with them formed the folk narrative in Lu Yao's novels, and the accepta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demonstrates its transcendent feature.

Key Words: Lu Yao's Novels; Folk Narrative Northern; Realism; Shanxi' culture

[编辑: 胡兴华]